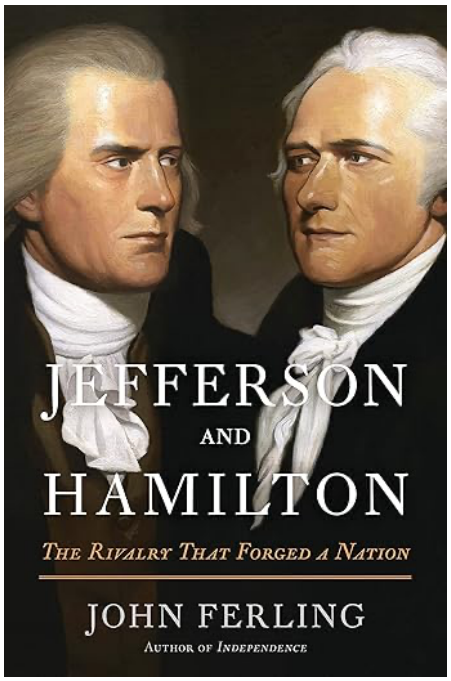
美國政治歷史的鐘擺：「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矛盾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



小政府主義與大政府主義的拉鋸戰

美國政治氛圍的趨向，經常在兩種願景之間擺盪，這兩種願景分別由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和第一任財長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提出來的。傑佛遜崇尚一個有限的聯邦政府，他優先考慮各州的權利、推動農業發展和個人公民的自由。相較之下，漢彌爾頓主張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威，從而能夠採取果斷行動，他又主張促進工業發展，故此，漢彌爾頓大力提倡設立中央銀行，而傑佛遜則強烈反對，這辯論代表了中央集權與崇尚權力下放的經濟模式衝突。在整個美國歷史中，人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這兩種政治哲學思想之間的此消彼長，它們以拉鋸戰的方式塑造著政策和社會優先事項。

二次大戰後美國積極干預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明顯擁抱漢彌爾頓的原則。受到了一戰和二戰的教訓，兼且面對着冷戰的威脅，美國聯邦政府認識到在一個迅速變遷和充滿挑戰的世界中，國家必須擴充實力和向前邁進，在國際舞台上，美國放棄孤立主義，積極干預世界事務；在國內，政府在各方局面亦扮演了主動的角色，例如透過在1950年成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1958年設立的太空總署等機構，美國政府對科學研究進行了大量投資。1956年開展的州際公路系統是一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工程，這進一步見證了中央政府對國家發展和協調一致的承諾。

此外，1960年代詹森總統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畫和「向貧窮宣戰」（War on Poverty），代表了聯邦政府在解決社會不平等和為公民提供安全網方面的高度參與，所有這些都是傾向干預主義的漢彌爾頓模式。詹森總統的計劃是自上而下，而馬丁路德金牧師倡導的民權運動在民間配合，雖然那些倡導基本個人權利的思想與傑佛遜式理想不謀

而合，但最終仍需要聯邦政府強力干預，以克服各州的對黑人民權的壓迫，這突顯了傑佛遜式的目標，有時也需要漢彌爾頓式的手段來實現。

列根強調政府就是問題的根源

美國政治生態中的個人主義，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對政府干預的反作用。1980年代列根的崛起，標誌著向傑佛遜式理想的回歸。 他那句著名的斷言：「政府不是我們問題的解決方案；政府本身就是問題」，代表了人民減少聯邦權力規模和範圍的願望，列根強調個人主動性和自由市場原則，不喜歡社會福利計劃，他曾經這樣嘲笑詹森總統：「我們向貧窮開戰，貧窮贏了！」這個時代的施政特點是減稅和放寬管制，旨在刺激私營部門成長，以及人們對大規模政府計畫的懷疑。但實際上，列根尋求與民主黨合作和妥協，在其八年任期內，聯邦政府的開支不但沒有削減，反而大幅增加，美國的國債亦大幅上升。

特朗普政府的新沼澤

現在特朗普政府似乎想要完成列根沒有做到的精簡機構和降低聯邦赤字，他剛剛上任便砍掉了多個聯邦機構，包括國際開發署、美國之音，而美國教育部則岌岌可危。此外，他大刀闊斧地透過政府效率部裁掉大量聯邦僱員，並且提議大幅度削減國家科學基金會、衛生研究院、太空總署等部門的研究經費。表面看來，這似乎是回歸傑佛遜式的小政府理想，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漠視法院判決，又利用聯邦政府力量要求大學順應其意識形態，這種集權趨勢又好像是漢彌爾頓式的強勢政府，畢竟，許多侵粉崇尚的就是強人政治。或者可以說，特朗普政府是採用漢彌爾頓式的手段，去達到佛遜式的目標。我相信聰明的讀者已經意識到這類運動的矛盾元素。

「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根源，在於人民不信任大政府、官僚、富商、學術精英、有權有勢者，特朗普將這場運動定位為一場「清理沼澤」（Drain the swamp）的草根起義，特朗普承諾顛覆現有體制，消除腐敗的機構，為人民奪回權力。然而，在實踐中，這場運動卻凝聚了自己的菁英階層，他的政府卻充斥著億萬富翁、說客和自己人，例如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美國中東特使維特科夫（Steve Witkoff），而馬斯克經常在不受問責的情況下，行使著巨大的影響力。這場運動營造出「深層政府」控制一切的恐怖氣氛，但這並沒有消除特權、帶來權力結構的扁平化，而是導致了權力在新的意識形態下重新鞏固。

清理沼澤的結果，可能是重新製造出一個新的沼澤；反菁英的言論，再次成為創造新菁英的工具。反菁英運動透過譴責政府權力膨脹和過度集中而崛起，然而，一旦他們獲得

控制權，就會將更多權力鞏固在自己手中。其實，任何大規模運動都需要協調、效率、合法性，最終這些都需要領導力、組織、權威，而這些正是菁英主義的要素。

《新階級》和「寡頭統治的鐵律」

這種悖論並非美國獨有，事實上，它反映了許多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軌跡。蘇聯及其衛星國最初是一股反對資本主義、特權階級的革命力量。然而，一旦掌權，他們就建立了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和官僚機構。在蘇聯，政治局取代了君主制；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取代了沙皇的秘密警察；國家計畫部門控制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曾是前南斯拉夫領袖鐵托的親信與政權高層之一吉拉斯（Milovan Đilas）撰寫了《新階級》（The New Class）一書，這本書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雖然財產形式上歸全民所有，但實際控制權卻落入共產黨幹部手中，這些人便形成了「新階級」，這個階級不是透過資本，而是透過政治與官僚機器來維持特權與地位。

一些政治理論家很早便認識到這種革命的悲劇性和矛盾性，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遠在1911年已經提出了「寡頭統治的鐵律」：一切組織，即使是以民主理想創立的組織，隨著時間的推移，也不可避免地發展成寡頭政治。這是因為大型組織需要專門的領導和官僚結構才能有效運作；一方面，領導者掌控組織資源與宣傳管道，另一方面，大多數成員傾向於服從領導。最後領導者只會關心鞏固自己權力和維護自身利益，而不會理會其他人死活。請注意，這是1911年提出來的理論！可悲的是，人們一直掉以輕心，歷史不斷地出現悲劇性的循環。

結語

那麼，如何才能打破這個循環呢？坦白說，這篇文章只是書生論政，若果我有答案，那麼我已經可以大濟蒼生，而不會留在夏威夷跳草裙舞。以下方案只不過是常識：首先，真正的問責機制必須嵌入到制度中，這不僅僅是選舉，還需要有透明度、保護吹哨者和獨立監督。其次，權力必須盡可能地分散，讓地不同持份者擁有真正的影響力，但同時又不會造成難以控制的碎片化。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意識到傑佛遜式和漢彌爾頓理想的矛盾、「寡頭統治的鐵律」、激烈的反特權階級只會製造「新階級」……這些悖論，我們必須有一種文化轉變，那就是擺脫彌賽亞式的領導，不要以為一個人或一個政黨便可以拯救一個體系，威權主義、強勢領袖只是誘人的神話。

2025年5月18日

〈美國政治歷史的鐘擺：「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矛盾〉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更多資訊